

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

一项人类学研究

[德] 恩斯特·图根德哈特 著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译文出版社

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

一项人类学研究

[德] 恩斯特·图根德哈特 著 郑辟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一项人类学研究 / (德) 图根德哈特(Tugendhat, E.)著;郑辟瑞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

书名原文: Egozentrität und Mystik Eine anthropologische Studie

ISBN 978-7-5327-4296-7

I. 自… II. ①图… ②郑… III. 哲学人类学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2871 号

Ernst Tugendhat

Egozentrität und Mystik

Eine anthropologische Studie

© Verlag C. H. Beck oHG, München 2004

图字: 09-2006-35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

——一项人类学研究

[德] 恩斯特·图根德哈特 著

郑辟瑞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98,000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978-7-5327-4296-7/B·267

定价: 1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Turning of Philosophy: Language and Practice

主 编 庞学铨

副 主 编 应 奇

学术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 怡 孙周兴 倪梁康 钱 捷

徐向东 韩水法 童世骏 翟振明

总 序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存在论转向”和近代的“认

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范式转变。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古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规范内涵。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向”——如果这种“转向”名符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串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

首先，“语言学转向”对 20 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或陈述的三分法，把价值判断放逐到无意义的领域，而元伦理学则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对价值词汇用法的琐碎研究上，放弃了理性地探讨价值分歧和规范基础的重要使命。50 年代以后的“后实证主义”革命冲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樊篱，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是实践理性转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义倾向以及此后继语言哲学而起的心智哲学研究取向，又引发了在规范问题、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问题上的新一轮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之争。直到 20 世纪末，“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匹兹堡新黑格尔学派内部，是像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那样继续坚持“语言学转向”,承认拥有信念和意愿仅仅是玩一种运用这些词汇的语言游戏,因而哲学的职责只是阐明我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践,而不是根据外在于这些实践的规范判断这些实践;还是像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那样,在坚持不具有概念结构的东西无法证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坚持非判断的心理事件能够证明信念的合理性,从而得出“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断,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的结论,这已经成了一场震撼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界并且波及德语学圈的大争论。而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语用学的“真理共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倡导的“语境论”之间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对于民主的规范含义的不同理解:对于真理共识论者来说,民主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识;对于彻底的语境论者来说,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诸如此类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对“语言学转向”究竟要转向何处心存疑虑。

其次,尽管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当代的“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复兴”又有它独特的背景和前提。实际上,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的演变昭示我们,这两种转向之间不但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绵延整个20世纪,横跨英美与大陆两大传统(新法兰克福学派中有把实用主义独立出来,与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鼎足而三者)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它不但构成了“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且为后一种转向创造了条件,或者说为更好地阐明自身的规范内涵创造了条件,这尤其表现在滥觞于日常语言哲学并经与美国实用主义互释后产生的所谓

“语用学转向”中。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理性转向”之重要一环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勃兴则不但在智识氛围上呼应了心智哲学在 20 世纪晚期哲学中日渐上升的地位,而且从智识效能上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于宣告分析哲学已死,“语言学转向”这一范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哲学中的(与语言含义相关的)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心智哲学中的(与心智内容相关的)个体主义与反个体主义之争,以及实践哲学中的(与规范辩护相关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这三者之间的纠结和紧张将引领人们重新审视分别由分析学派和现象学派在 20 世纪初以反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名发起的哲学革命的潜能是否已经消耗殆尽,而这不但关乎自古希腊以来即已奠基的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事业的命运,而且与人类对于自身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上海译文出版社历来重视当代西方哲学重要著作之译,所创设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更是在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深受读书界的喜爱。“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踵武前贤之事业,尝试以更为主题化同时也更富时代感的方式系统地译介 20 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代表性成果。一方面旨在围绕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集中展示语言分析传统对于价值与规范的理性和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重视把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的著作;另一方面试图较为全面地呈现“实践哲学复兴”中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对古典哲学的根

本问题和现代性的根本内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的探讨,还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我们期望并且相信,根据对于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上述理解和把握,按照问题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哲学同仁们艰苦、扎实、细致的工作,本译丛必定能够把中国哲学界和出版界的西学译介工程真正推向深入,促进学术界对于 20 世纪西方哲学建设性成果的全面总结,并最终为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滋养。

本译丛得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支持。

庞学铨 应奇

2007 年 1 月于杭州

目 录

001 导论

第一部分 面对自我

007 第一章 命题语言与说“我”

023 第二章 “好”与“重要”

038 第三章 在实践中的说“我”：自我主动化和责任能力

056 第四章 副词的、审慎的和道德的好；理智的诚实

076 第五章 面对生死

第二部分 放弃自我

097 第六章 宗教与神秘主义

132 第七章 惊奇

144 附录 论历史性与非历史性

导 论

“神秘主义”这个词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直觉的启迪,但是,这种含义不过是边缘性的。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更加重要,它认为,神秘主义就是一种主客统一的感受:神秘主义者感觉自己以某种方式和神、存在、一切事物“融为一体(in eins)”。这一点标识出东西方大多数神秘主义思想的一个本质方面,但是,我认为,它还不是核心方面。我相信,一切神秘主义都要从某种动机出发来理解:这种万物一体(All-Einheit)的神秘感受不是凭空而降的,而是要人们去追寻的。为什么呢?对此问题的一种回答是:人需要灵魂的安宁。

这个答案自然会引出进一步的问题。和其他动物明显不同,人有灵魂安宁的需要,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因为,像佛陀所说的,他们在受苦(因为其他动物也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处于不安之中,其他动物则对此一无所知。这种不安和某种特殊的人的自我指涉(Selbstbezug)相关联。或许可以说:一切神秘主义都有某种动机,要摆脱为自己操心,或者抑制这种操心。如果说神秘主义就在于上述的融为一体的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又奠基于人的某种需要:从人的自存(Selbstsein)的孤立状态和人看重自己、为自己操心的特殊方式(关心别的东西时也是这样的)中摆脱出来。换句话说:神秘主义就是超越本己

的自我中心性(Egozentrität),或者使其相对化,这种自我中心性是所有其他不会说“我”的动物所不具有的。想要理解神秘主义的动机,就必须理解说“我”者(“ich”-Sager)所特有的自我中心性的问题。

因此,我们显然要着手进行在新近哲学中出现的以某种方式对自我和自存的追问,自我指涉的这些方面也得到重视,它们被看做是获得灵魂安宁的障碍。虽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时代的人,但是,我试图理解某些方面,通过这些方面,人在文化上发生分化之前就通过说“我”(“ich”-Sagen)和人类语言的命题性(Propositionale)而区别于其他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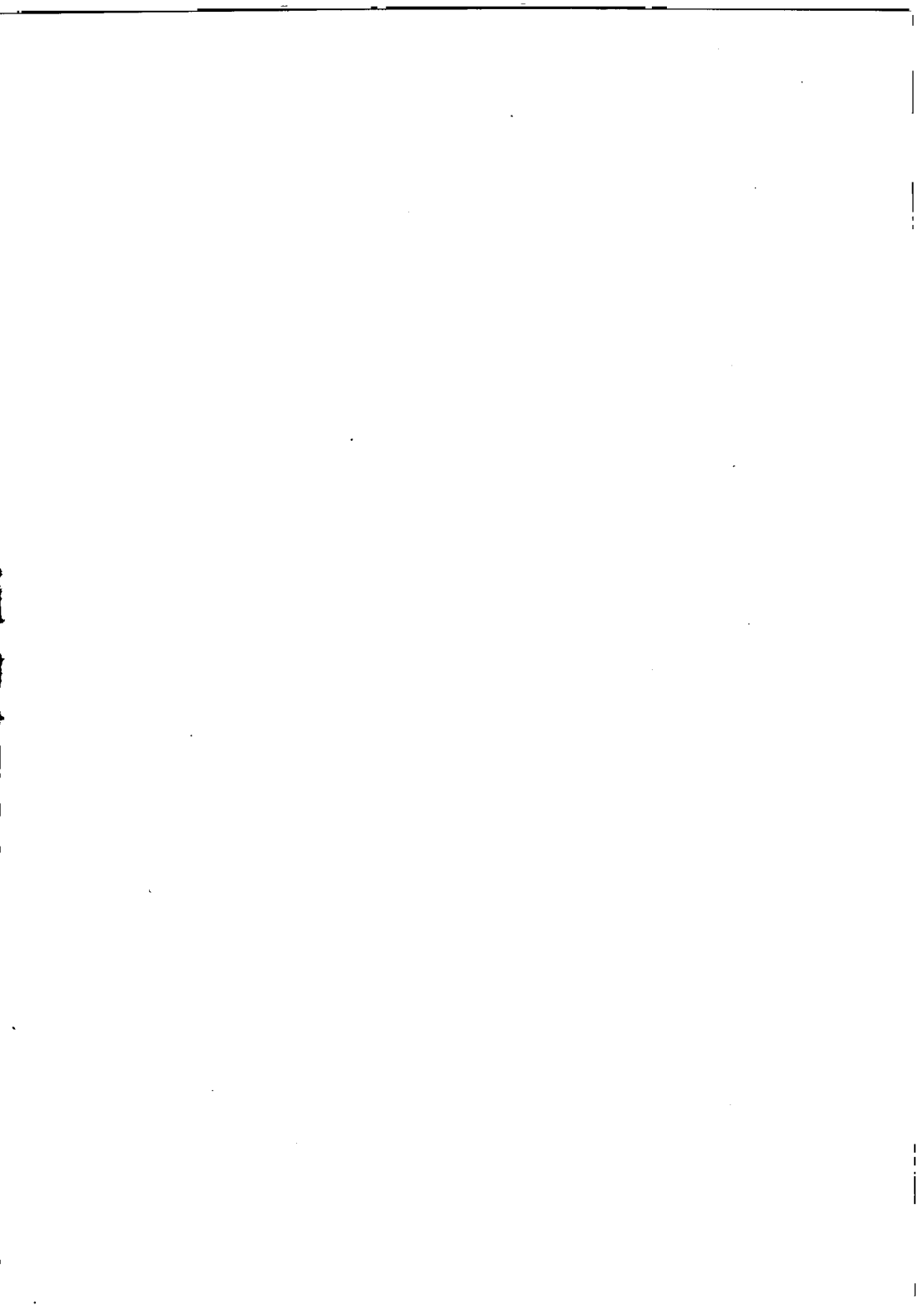
德国唯心论哲学和精神分析都谈论自我(dem Ich),而这就引发了一种错误的想法,即,人们内心中有一个自我。当今的分析哲学有时也谈到“自我-概念(Ich-Begriff)”。但是,“我”首先是一个语词,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个词,那么我们是否还会谈及一个这样的概念。

我常常说说“我”者,而很少说人,或者就说我们,这是因为,人并非一开始就能够说“我”,在这项研究中,我感兴趣的是人的某些特征,人之所以具有这些特征,这是因为它们能够言说命题语言,能够说“我”。我也很少使用当前哲学最通行的选项,也就是谈论我们,因为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指的都是谁?虽然,在哲学反思时,人们当然应该以第一人称来言说——就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但是,我认为,总是注意和其他动物做比较,这会大有裨益。

当我常常谈及“其他种类的动物”时,我指的是那些不会说“我”的“高级”动物。看起来,一切意识都具有某种形式的自我指涉,这当然也包括我们假定其他高等动物也具有的意识,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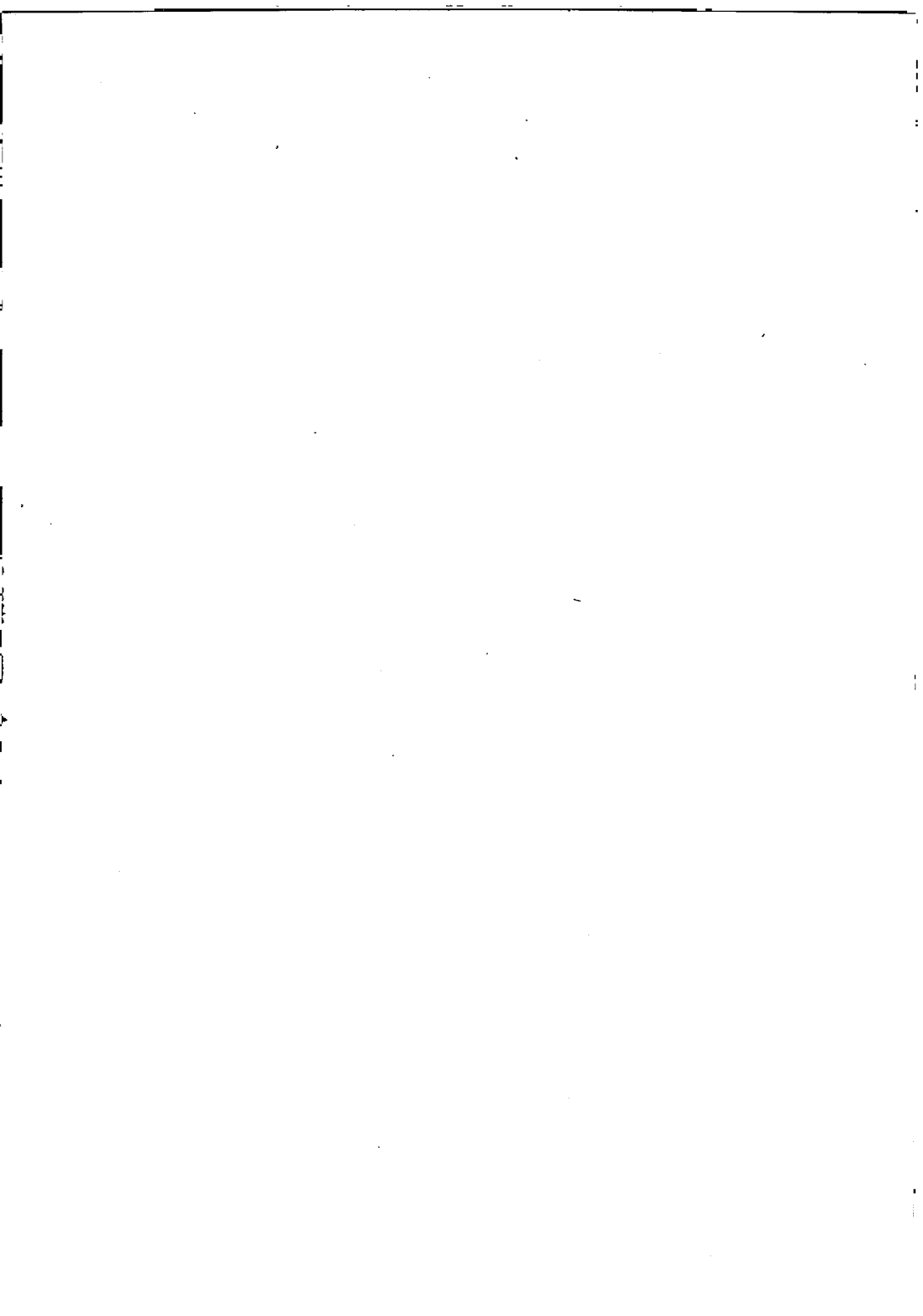
然,也包括婴儿所具有的意识。^① 如何理解这种一般的意识和它所包含的“自我中心的感受性”——一种加引号的自我中心性,对此,我和其他人都只有一些非常不确定的想法,这些在接下来将只会作为模糊的衬托背景而出现。其他的动物没有对自我的表象,因而,它们也不能看重自己,设想它们会和自己保持距离,这一定非常奇怪。

^① 泰勒·伯奇(Tyler Burge)说:“某种非概念的自我中心的感受性。”C·赖特(C. Wright)等(编),《认识我们自己的心灵》(*Knowing our own Minds*),牛津,1998,第248页。



第一部分

面 对 自 我



第一章

命题语言与说“我”

我们当然不能通过分析“我”这个词的使用来理解人的面对自我的结构所包含的所有内容,不过,还是能理解相当一部分内容。我认为,从这样一种分析出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将在第三章中通过分析一种特殊的含义差别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这些含义差别是这个词在其实际使用中所具有的;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关于好(Gute)的研究应该可以补充对自我指涉的理解;在第五章中关于和自我的关系的思考将会超出“我”这个词的使用所能澄清的范围。

人是从一定年龄开始才成为说“我”者的,不过,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当然他们也必然如此,这是因为他们说一种命题语言。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进行的对自知自悟的分析是从一种人类学反思的观念来理解的,据此观念,命题性的语言结构被看做是某种生物进化的产物,我们可以由此出发来理解许多(并非全部)通常被看做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比如:合理性、自由、使自我和环境对象化、价值和规范意识、说“我”。^①